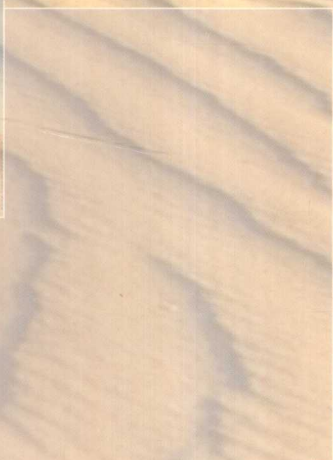


华文诗歌传统整合个案



沙鸥的诗论与创作研究

赵心宪/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华文诗歌传统整合个案

沙鸥的诗论与创作研究

赵心宪 著

I207.22
ZXX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文诗歌传统整合个案 沙鸥的诗论与创作研究/赵心宪 著.-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7

ISBN 7-81094-885-7

I.华… II.赵… III.沙鸥-诗歌-文学研究

IV.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3659 号

华文诗歌传统整合个案 沙鸥的诗论与创作研究

赵心宪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建设北路二段四号,邮编:610054)

责任编辑 谢晓辉

发 行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94-885-7/G·203

定 价 20.00 元

20世纪中国新诗文化价值观照 的前提思考(代序)

新诗成为文化研究对象的理论依据,在于文学与文化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如果说哲学、科学偏于诉诸一个文化整体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伦理学诉诸一个文化整体的行为方式,那么,文学则偏于诉诸渗透于民族文化方方面面的情感方式。因对社会心理具有潜在的广泛影响,文学在文化结构中所占据的具体位置和发挥的实际功能,被视为文学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有学者认为: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并非一切文学现象都足以升格为文化现象,因为“文化价值是深刻、稳定、恒久的。”^{〔1〕}换言之,没有真正影响文化结构演化的文学现象,理论上不能视之为具有深刻、稳定、恒久文化价值的文化现象,成为文学文化观照的对象。文学现象的新诗及其理论,正因为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不断起着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功能,观照与其审美价值结合的文化价值,在强调建设精神文明的今天,才格外引起新诗研究者的重视。20世纪中国新诗文化价值观照的前提,应当是探讨新诗成为特定文化现象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在语境构成、深层动因等方面的具体联系、

实际体现,及其研究涉及的切入点、立足点等基本理论问题。

(一)

司马云杰先生曾把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史视为一个漫长、艰难、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这一文化变迁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经过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社会经济改革,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仍然是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继续。”^[2]一般说来,文化变迁所引起的文化转型,是文化进化过程中的质变现象,是文化体系及其构成要素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即文化结构演化的范式转型,冲击到文化结构的三个基本构成层面:物质文化的变化,体制文化的转换和观念形态文化的更新。其中观念形态文化的更新是文化转型最根本的标志,包括政治思想、哲学理论、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审美情趣、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居其核心地位的种种思想理论观念及伦理规范。在亚细亚文明圈内,中国封建文化两千多年来一直在超稳态的文化结构中发展,文化转型实由鸦片战争爆发才真正开始。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两个剧变期已得到理论家们的确认。一是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对旧传统文化的革命,企图建立西方式近、现代文化的巨大努力:开创近代工业,推翻帝制,传播科学与民主等现代文化观念等等,虽然仅仅促进由封建社会向民主社会的社会形态转型,文化结构并未因此根本改变,但现代新文化的诞生因此而具备了条件。这个剧变期出现的新诗运动,在中西文化剧烈冲突语境中,由文学现象承载文化现象的意义,学者们已有认识:“白话新诗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新文化革命中所充当的是一种先锋的角色。它不是

一般的文化革命,它的文体革命的目的,是服从于整体的时代追求之目标的。因此,作为一种新文体,它本身所肩负的使命比诗这一品种所应承担的重得多。”^[3]于是作为局部的新诗文艺本体属性的牺牲,换来旧传统文化的整体性转型,作为文学现象的新诗,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参与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伟大历史变革:充当文化急先锋,宣传科学、民主,提倡个性解放,鼓吹个体本位的西方文化思想。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是为典范。梁实秋曾慨叹五四时期“偌大一个新诗运动,诗是什么的问题竟没有多少讨论”(《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这种见解,正是梁囿于诗美的理论域限,漠视了新诗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期,作为文化现象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价值所致。相反,梁的好友闻一多曾激赏郭沫若《女神》的时代精神,高度评价《女神》代表的新诗及其激进的文化价值取向。闻一多早已深悟胡适“尝试”新诗,只是其文化哲学思维方式的一种文学实践形式。新诗实际成为胡适文化哲学观念在文学革命方面的派生物,其中内涵的白话文学发展的历史主义文学观,比较白话文言优劣的语言哲学观,工具意义上的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文学整体观等等,都是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种种哲学思考。时至今日,这些纯然西化抽象的文化精神产品,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仍持续不断地产生影响,当然少了新诗审美形象的艺术魅力。而郭沫若自由体新诗对民主、自由的呼唤,自然、自我的崇尚;冰心小诗对自然、母爱与童贞“三位一体”爱的哲学的阐释……其文化哲学的抽象意味也是分明浓厚的。

20世纪末,我国进入近代以来文化转型的第二个剧变期,与五四时期社会形态转型语境的根本区别在于,这一次是在社会形态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文化结构的现代化变革。五四时期的中国处境飘游虚弱,说不上国家主体的存在,当今中国却是社

会主义强大实体的主权国家。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冲突中,西方现代文化以破关入侵的态势长驱而入,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走西体西化之路,意味着丧失自身而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因受制于国情,当时社会形态的转型并未结下文化转型的硕果。而传统文化此后在苏区、解放区及建国初30年的变革,似未真正触动文化结构的深层因素,其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当代文化的大倒退。传统文化以社会群体为本位,个人的文化价值是被忽视乃至否定的,封建社会家庭及家庭扩大化形成的国家是个人的绝对权威,个人行为必须服从家长和王权的文化价值标准。个人的人格、地位、尊严和利益附属于家庭和国家,个人价值由其所属的社会群体认可。建国初30年,家庭作为经济单位的权威被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种种社会单位(城镇的企事业,农村的生产队等)取代,单位是个人获得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基础,个人依附于单位成为所谓“单位人”。这样,传统文化以社会群体为权威的文化价值取向,反而在新的社会形态进一步被强化了。新中国改造了封建主义的旧传统文化,发展了社会主义新传统文化。新时期改造了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发展了社会主义新传统文化,以我国强大的国家主体为后盾,开放国门,主动迎接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反思、扬弃新传统文化,从而真正走上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之路:转变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融入个体本位的文化体系;改造泛政治化的文化构成,建设全面、均衡的文化体系;改造高度理性主义内涵,建立超越性的文化空间;改造一元化文化权威体制,建立开放的文化结构……。^[4]这实质上是针对建国后新的传统文化无意识层面种种文化悖论顽固存在,某些封建的、腐朽的文化像幽灵一样仍然在我们生活中徘徊的现实,以立足于人的观念现代化需要而提出的文化策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或生存模式,其核心是人

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人的世界最深刻变革的文化结构转型,代表着人的根本生存模式的转变。文化转型在人们深层次文化心理引发的震荡,五四新文化运动急先锋的白话新诗曾率先作出呼应。而与五四新诗运动明显不同的是,作为“文革”后新诗运动语境的文化矛盾比五四时期复杂深刻得多。彻底清除“文革”这个社会主义新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痛变异化的意识形态困难,仅属于社会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多年来中国文化被动转型树立起来的“永远先进”的西方文化样板,早已发生了由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的转折。西方思想家企图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解决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引发的社会危机,曾催化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急速膨胀,而西方社会发展中历时态经历的前现代化与现代化,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文化矛盾,在中国竟同时展现,构成当下中国文化矛盾的基本态势。这样,由于文化矛盾对立面的交错重叠而相对模糊,随着新时期文化结构冲击层面的转移,新诗运动顺应裂变为三个时期,从创作到理论,主导倾向依然充任着文化转型先锋的角色。但其文化价值内涵的丰富与复杂,简单肯定与否定二元逻辑的粗率判断是绝不可能说清楚的。

首先,朦胧诗现象的公开出现以北岛的《回答》在《诗刊》1979年第3期发表为标志,所谓“抒写一代人理想的幻灭和在反思批判中展开负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一代人的觉醒”,意在经过“文革”突变后,于当代大陆新文化传统结构中探求真正的人的位置。这远远突破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政治文化批判冲击到的文化结构层次。此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正拉开序幕,文化转型以体制层面为突破口,联产承包责任制掀起农村经济改革大潮,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朦胧诗诗人们三分之一以上有影响的作品虽然实际写于“文革”之中,主体

倾向化为一种诗化的社会批判,但其成为新时期初期具有轰动社会效应的文化现象,正是改革开放伊始社会渴求“大写的人”所赋予的文化意义。这首先是对“文革”反文化本质诗美形态的哲理思考,以激进姿态醒目超越现实社会中文革批判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的层面,扮演着文化变迁的急先锋。誉之为“新的美学原则”似可接受。但这种出自艺术理论的诗学评价,因为论争问题理论话语的局限,其实并未真正达到观照朦胧诗文化价值应有的理论深度,反而因之招致更多的批评,现在看来是情理中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文化转型进入新时期第二阶段,痛苦异常:“各种思潮的纷然杂陈,不同见解的相互激荡,新旧观念的冲突与混合,给人以无所适从的感觉。”^[5]1986年10月,《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大陆诗坛出现所谓“春秋战国”态势,“第三代”诗人们“一夜之间”群体登台亮相,他们向社会展示的似乎不是诗作,而是个性凸现的诗人们个体差别的文化存在。文化转型当时徘徊于体制与物质层面间的关联域,由此搅动整个中国文化现实的混乱景观,给了第三代诗张扬多元文化主张的机会。这种对当代中国的泛政治化文化结构和新的文化传统一元化价值取向的猛烈批判,的确收到文化先锋的社会变革功能。批评者不自觉集结为对立的两派,间或有清醒的思考者,^[6]也只是把这种文化现象等同于当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典型表现,而非据此冷静切入到更深层次的文化转型动因上去。应该提到的是汪国真现象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公开发表之前,有论者认之为“文化真空”的产儿,似乎根本不值一谈;诗坛更有痛斥其为诗艺误区者。汪氏新诗的文化价值恰恰在于它的存在,从第三代诗的日

常生活审丑,回归到传统诗歌文化理性、和谐、唯美的境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定文化氛围之中,汪诗因其明确的接受对象,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读者,这种主动进入文化市场的实验,全盘否定未必公允。新诗的发展前途应由创作与接收两个主体共同承担,拒斥、轻慢任何一方,都可能把新诗推上歧途。

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明确的文化目标,是在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话发表之后。文化转型得以直入文化结构的观念层面,一时观念更新掀起大潮。在一边努力完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一边尽量满足市场文化意识的强大社会心理需求中,以消费和大众传媒为中心的文化扩张态势咄咄逼人,文化先锋的新诗,一时演化为20世纪90年代文艺还原复现日常生活狂潮下的潜流。其实,它并没有放弃对文化结构变革主流的影响,这位先锋由台前(精英文化)一时退到“幕后”(大众文化),从而变形为更富于社会扩张性的隐形文化形态。这个过程中,诗人于坚的《0档案》算是一个“露头”,能产生影响的新诗作品,每每以通俗歌词的体例为社会认同(如崔健的摇滚歌词等),成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特别景观。如果这个期间从诗歌划定的界域步入更大的文化圈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所谓“后新时期”热点文化现象,诸如王朔热,电影《霸王别姬》的获奖,小说《废都》流行,海子等青年诗人为诗歌而自杀,顾城出国寻找“理想园”最终杀妻自尽之类,都催促学人反思新时期文化转型各种文学现象质变为文化现象的深层动因,以文化观照的学理探讨,给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建设性的思考。

(二)

新诗的文化价值在文化转型剧变期有较为引人注目的提示,上述五四时期与新时期将诗歌运动、诗潮群体或诗人诗作等等称之为某某“现象”即为实例。除此之外,因为文化转型处于渐变期,西方文化思想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因与社会文化心理兴奋点的疏离关系,新诗的文化价值有复杂得多的内涵。例如新文学 1927~1937 年,与 1937~1979 年两个发展期,新诗的文化语境截然不同:后者有着时代重大而统一的主题(如抗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化大革命等),诗人的创造欲望多源于时代话语的需要,轰轰烈烈也颇有社会效应,但个人的独立性认同于时代的共同主题,诗人的个性相对弱化;前者因进入较为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发展时期,民族的精神走向出现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诗人的创造个性因时代多主题的需要而得到强化,然而正因为诗艺自身的限制,新诗运动不过属于诗坛热点,并不能突入到大文化圈内,对社会时代的影响有限。总体上看,这两个发展期的新诗现象,诸如新月诗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普罗”诗派,抗战诗歌、“七月”诗派、晋察冀诗派、“九叶”诗派、解放区诗歌,“颂歌”诗潮、新民歌运动、“文革”诗歌、“归来”诗潮等等,与文化结构的范式转型,好像没有直接影响,新诗文化价值的阐释应深入一步,观照创造主体方面更深层次的动因之所在。

王富仁先生根据中国现代文化的特点,曾画出两个文化结构的示意图,一为 1949 年之后中国台湾地区文化的塔式结构(自下而上层面为:社会群众、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新儒家、国民党政权);一为中国内地一度演化而成的文化结构(自下

而上分列为社会群众、英美派知识分子、左翼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7]均突出海峡两岸文化转型模式中,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角色及其文化结构功能,实为对中国现代文化冲突的本质较有深度的反思。中国内地五四时期精英文化圈内掀起的文化论争时断时续,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语境问题各有不同,但基本思路却极为相似,总是在中西对立,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讨论现实问题,阐释转型期中国内地的文化冲突,显然偏重于文化现象自身,浮在问题的表面。现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实质为一种自然经济形态文化与现代商品经济形态文化的冲突,这个冲突贯穿于20世纪百年来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全过程。究学理而言,民主与科学是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体系构成的要素,两者的有机统一即为现代商品经济文化的内在核心。商品经济文化离不开民主与科学,所以鼓吹它;专制与愚昧的自然经济形态文化,当然视之为异端谬论,压制排斥之。因之两种形态的文化冲突,以民主文化与专制文化,科学文化与非科学、反科学文化的尖锐对立为表征。所谓民主,即现代知识分子认定的民主意识、个人独立人格意识和个体权利与义务等意识。回顾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痛苦历程,现代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充当着民主、自由与科学的张扬者,这种文化现象的深层动因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

文化哲学研究者指出,文化转型引发的文化进化,都是人们自觉思考原有现实生活状况的结果。引起这种思考的原动力,在于每时每刻对自身生命自觉优化的强烈愿望,同时又完全相信自觉优化的可能性。因此总给自我提出改变现状,塑造自我新形象的任务。因此哲学意义上的“新人”得以生成,都是以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新思考为依据的。这样,人们对世界的自觉改

造意识,总以标志“新人”生成的创造意识为基础,这就是哲学家所谓人创造文化,推动历史文化变迁“自我意识”的核心内容。^[8]显然,人的现代自我意识的生成与传播,是中国文化观念层面现代转型的关键所在。历史早已证明,在社会大变动时代,先进知识分子催生新的自我意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以新的自我意识为基础的新思想新理论形成之前,先进知识分子总是刻意努力从事创造新的自我意识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王富仁的现代中国文化结构图示可谓意味深长。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转型期文学现象的新诗,是因为成为时代新的自我意识生成的形象载体,而质变为文化现象的。对应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两个剧变期,新诗载负建构现代自我意识的文化功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五四时期参与文化革命的知识分子,无不以新诗为新的思想标志,新的斗争武器和新的交流工具,不作新诗似乎成不了新时代的文化精英。1917年2月号《新青年》首次刊载胡适《白话诗八首》,6月号续发其《白话诗四首》,新诗成为五四新文学最先登台亮相的文类。虽说这些初期作品算不上审美形态的新诗,但其示范影响和文化意义不同寻常。继鲁迅先生“敲边鼓”试作之际,新诗狂潮旋即变为五四青年情绪、愿望与生活方式现代自我意识的写照了。改革开放时期,新诗潮之后的新诗,更是由于“以流行歌曲的形式与音乐和电视、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结合交织在一起,形成极富感染力、传播效果的方式,当它与音乐、舞蹈相结合,在青年的群体文化活动中病魔般地传播的时候,它就在沟通青年文化群体中个体间的情感与思索,希冀与追求,认同和归宿方面,担负了巨大的中介作用、催化作用和导引作用。”^[9]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新诗与五四时代一样,为中国文化转型保存了更多的具有深刻、稳定、恒久之文化价值,知识分子、文化人现代自我意识之“活体”:或是对现

代宏观生活的浓缩,或是对司空见惯的现实生活选取某个部分所做的微观切片,或是托出一团生活、思想溶解其中有血有肉的情感等等,经过诗人诗化处理而呈现出的有机形态。^[10]谁要去寻找改革开放时期文化冲突触发的历史反思,危机与荒谬意识,反传统精神,以及感性和情感力量这些“现代自我意识”的种种内涵与曲折表现,新诗(特别是其中的“现代派”)是无可争议的首选对象。文化转型的渐变期,创造主体因时代文化氛围的刺激,或张扬个性(如现代派新诗),或张扬共性(如抗战诗歌),或扭曲自我(如“文革”诗歌)……自我意识虽不一定统统打上“现代”的标记,但一样成为文化转型的“活体”,其文化价值也是不能漠视的。

(三)

转型期新诗文化价值研究的切入点,应落实在文学与社会既定文化价值规范的冲突上。学理上说,文学运用它对生活表现的敏感触觉和对灵魂世界的透视,描述当今社会的文化冲突,表面看来,文学似乎能超脱地与文化和平共处。其实不然,“文学与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的表达方式,在结构上有着一一种整体性的矛盾冲突;只要有文学、文化存在,就一定会出现文学审美情感对既定文化价值规范的冲击、突破现象。”事实上,任何一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文学都作为文化的突破口,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运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似乎均以文学审美情感的觉醒为发端。现代中国的特别之处,是新诗成为文学审美情感觉醒的先行者。有学者认为,人类有两类情感总是被推入了文化冲突的涡旋之中。一是所谓文化性的情感;它是由社会既定文化价值规范长期影响、训练而成的,

合于群体的要求,是来自主流文化结构价值认同的情感形态。另外则是文学审美情感,是人的主体创造欲望唤起的生命激情,它不断要求创新、突破,以心灵的无限自由,追求精神的绝对超越,总伴随着心理常态无法言说的心灵景观。这样,两种情感以从众的情感理性与个性展露的创造冲动,构成规范与自由,有限与无限,群体与个人,主流意识形态与自由意志心理等等对立面为冲突内容的文化与文学永恒的矛盾。上述文化革命正是利用这些矛盾的合法存在,借文学情感自由本质的开明,隐曲变相地传达与社会既定价值规范的漠然态度与决然对立。新诗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巨变期反应之敏捷,之“现代”,特别引人深思,如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时期的新诗,我们似已很少见到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等“现代派”诗作所标举的文化启蒙理想、意识形态批判精神和生命意义的价值,被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的感性欲望,日常生活的琐碎需要,以及人在现实生活中未免粗俗的直觉性经验(诸如入厕过程细节之类)。新诗因其艺术形式无穷变化的任意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易操作性常常成为模仿西方现代流行艺术最早的试验工具。诗作者随心所欲选用其个性情感传达的方便形式,既是表现自由意志创造欲的需要,也是个人情感寄托性宣泄的需要,一种得风气之先现代意识显示或卖弄的需要,更是文化转型期青年知识分子、文化人形象宣谕的个人启示录。所以,文化观照转型期新诗的文化价值,切入点应对准诗与社会既定文化价值规范冲突的内涵方面。感悟新诗语言的艺术表现力,探讨其艺术美的技巧运用,玩味其审美品格的个性生成,分析其文体演变的历史发展实绩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都是必须认真完成的工作。这是文化转型期新诗研究的美学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因为新诗首先是诗。

(四)

文化转型期新诗文化价值研究的立足点,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现实。青年学者许明在谈及当代中国新理性的建设时真诚地说:回避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偏见和自慰式的理论活动,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政治概念,而且也是实际存在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结构。自称为理论家的中国学者,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理论对象竟然无话可说或无新鲜话可谈,不是十分滑稽吗?”转型期新诗文化价值的研究,正需要“新理性”的帮助,即在清醒的文化意识的指引下,考察新诗作为文化现象的基本特征、典型表现,及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心理内涵。清醒的文化意识是一种建立在明确的文化观念基础上的文化态度(“什么是文化”,“要怎样的文化”以及“怎样对待文化”为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文化不仅是历史而且更重要的还是现实。离开现实的创造,离开对现实的理解,文化就变成了一堆毫无生命的历史古迹。因此我们需要以整体的眼光,历史的态度和面向未来的新时代意识的文化理论,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全过程,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所面临的各种文化冲突(例如政治本位与经济本位的冲突,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冲突,真理与价值的冲突,群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冲突,理性与利欲的冲突,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等级观念与平等观念的冲突,意识层面的反传统倾向与潜意识层面的传统倾向的冲突等等),产生的各种文化困惑,及其形形色色的文化畸变现象。人们常说文艺是社会转型敏感的神经,其中青年亚文化的新诗更是文化转型的神经末梢。它以迅速变化的现代话语形态,权当艺术的现代范式,奇妙而超前地传

递着新旧文化传统更替过渡时期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侧面。“文化正是与人,与人的灵魂密切相关。它的作用是无形的,却又是最为深刻,最难以把握的。”^[1]没有清醒的文化意识,没有面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现实的勇气,我们就会在新世纪世界文化转型大语境中,成为丧失现实文化立足点,四顾茫然“漂泊的心灵”,如此将遽论转型期新诗的文化价值呢?

《20世纪中国新诗文化价值观照的前提思考》写于“沙鸥诗论转型过程研究”课题提出申报的时候,即1997年10月。第二年(1998年)“沙鸥诗论转型过程研究”被重庆市教委批准为社科项目课题,此文也在一家兄弟院校学报上公开发表。沙鸥诗论转型研究是怎么想到与新诗文化价值观照的研究联系起来考虑的呢?

这首先出于一个看起来似乎偶然的机缘。1997年10月中旬,为了筹建巴渝文化名人研究所,曾约请学界的朋友讨论这个研究机构设立的可能性,也请他们提供最新出版的故乡文化名人的著作,以作讨论的基础。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的《沙鸥谈诗》(止庵编),是此次聚会收到的30余种书籍中的一本。因为参与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研究的资料阅读习惯,当时就把编者关于本书的《序》、《跋》联系着读了一遍,大为感动。沙鸥先生的诗名我是知道的,古远清《中国当代诗论50家》(1986年)对沙鸥的评价我还记得很清楚:“公正的说,沙鸥是个勤奋的诗人。四十余年来,先后出版了二十余种诗集。这其中有不少确属他自己所说的‘既粗糙,又贫血’之作,但也有像《故乡》那样经得起品味的好作品。综观他的创作实践,可以说他主要不是用理论而是用作品探索着新诗的形式。”这个评价与《沙鸥谈诗》提供的材料差距较大。对沙鸥1985年以后“衰年变法”的创新努力与